

不以公事而售私恩

——公与私的历史镜鉴（三）

□ 陈家兴

处在公权力岗位上，不顺手牵羊、趁便捞点好处，如果没有一点觉悟和境界，是很难的。只有那些有风骨的人，才能把公与私分得清，绝不会占公家便宜，以公权谋取私利。一些有境界的古人，在这方面甚至能做到极致。

春秋时期，晋国大夫范鞅杀了意图谋害自己的羊舌虎（一说是范鞅诬陷），又囚禁了羊舌虎的哥哥叔向（“叔向”其实是他的字，他原本名叫羊舌肸，是晋国大夫，与郑国的子产、齐国的晏婴齐名）。这时，乐王鲋来见叔向，就说会在范鞅面前为他求情。可是叔向却不领情，没理睬，乐王鲋走时也不拜谢。在今天一些人看来，这简直是不通人情，即便内心知道人家只是口头说说，你虚应一下也不为过。当时，他的哥哥羊舌赤等就埋怨叔向。叔向便说，真正能救自己的只有祁奚祁大夫。众人不解，叔向说，乐王鲋是顺从君主的人，哪里能行呢？祁大夫“外举不弃仇，内举不失亲”，为人正直，怎么会唯独不救我呢？

结果真如叔向所料，乐王鲋见了晋平公，反而说了叔向坏话。自古而今，如乐王鲋般奸滑的小人真是不绝如缕。倒是祁奚听说他被囚

禁，虽然已经告老还乡了，但还是赶回来见范鞅。引经据典说了一番话，终于说动了范鞅，和他一起去见晋平公，赦免了叔向。

在今天人们想来，这之后定是祁奚来见叔向，对其大加勉励，叮嘱他出来了要好好干，顺便接受叔向的谢恩，而叔向定是对祁奚感恩戴德，叩谢不已。然而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完事后，祁奚不去见叔向就回家了，而叔向也没有向祁奚道谢就直接上朝去了。显然，叔向深知祁奚的秉性为人。他救自己，是为江山社稷，不为私人情义，根本用不着谢恩私门。这就是士人之间的相知。

一些人可能会认为，这两人都太耿直太傻了。对于叔向来说，于私，人家救了你的命；于公，祁奚为国家挽救了栋梁，所以感谢一下祁奚也不为过，正好可以去联络一下感情。这都不去当面感恩，让好人以后怎么当呢？对于祁奚来说，正好可以借为公办事而兜售私恩，培养圈子，涵养人脉，此时不为何时为？顺理成章地就把人拉到自己这一边了。

这样的逻辑和观念，有的人会觉得理所当然。事实上，在形形色色的假公济私中，借公办事而售私恩最为常见。比如当权者明明是为

公办事，却非要搞成是因为你才办这事，所以你要谢他的恩。遗憾的是，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，对此并不以为意。其实，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，这就是“灰犀牛”事件，人们习以为常，视而不见，及至成祸，却已晚了。今天“圈子文化”之所以根深蒂固，其内在机理正在于此。一些人搞山头主义、拉帮结派、团团伙伙、任人唯亲、排斥异己，趁的正是办公事的便利，兜售的则是私人的恩典，甚至打着为公旗号办着私事。

其中尤为突出的，就是在用人上搞“拜官公朝，谢恩私门”那一套。一方把对组织的感恩变成了对个人的感恩，一方则把党的干部变成自己的“家臣”，结果就是相互“投桃报李”，导致政治生态污浊，恶性循环成“圈子文化”。倘若官场此风盛行，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起来呢？

事实上，在古代那些有境界的士大夫身上，内心里都有一道公与私的界限。公就是公，私就是私，绝不相混，更不会假公济私。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，他们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杆。

据《晋书》载，西晋开国元勋羊祜，任职历魏晋二朝，“其嘉谋谏议，皆焚其草，故世莫闻。凡所

进达，人皆不知所由”，就是他所举荐的人，都不知是谁举荐的。当然，《三国演义》里说他举荐人才又自焚奏稿，应该是据此推演的，焚稿主要是指他献的好计谋和正直的言论而言。后来，有人就说他“慎密太过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你这样太过谨慎没必要嘛，让人知道是你推荐的也没什么嘛。羊祜却说：“不能举贤取异，岂得不愧知人之难哉！且拜爵公朝，谢恩私门，吾所不取。”所以，其心心念念的，还是举荐人才的职责，而不是为了让人才私下谢恩自己。

和羊祜相似的还有宋朝宰相范纯仁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：“纯仁凡荐引人材，必以天下公议，其人不知自纯仁所出。”和羊祜一样，被引荐的人才也都不知道是谁举荐的。有人就问他：“为宰相，岂可不牢笼天下士，使知出于门下？”这意思很明显，就是应该借此拉拢人才到自己门下。而范纯仁回答得刚正：“但朝廷进用不失正人，何必知出于我邪？”说白了，就是为国选才，谁引荐的无关紧要。



战国时期的秦赵长平之战，历来为人所关注，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，不少经济学者对此战也十分感兴趣。长平之战是一场决定全局走向的战略决战，可以研究的内容很多，秦所表现出的战略定力尤其值得关注。

清晰规划

秦国的战略定力来自清晰的战略规划。范雎为相后，秦国的总体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，远交近攻方针逐渐清晰，三晋成为重点打击对象，赵国又是重中之重。赵国经过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的改革之后，军力强盛，按照“先弱后强”的次序，攻打赵国应该是秦国最后的“大餐”。

上党地势绝佳，俯瞰三晋。长平之战前，秦将白起拔上党光狼城（公元前280年），胡阳惜败阨与之战（公元前269年），一胜一负，秦军对上党有了深入的火力侦察。秦越发感到上党的重要性，志在必得。秦得上党，韩命悬一线，赵也面临被分割成东（邯郸）西（晋阳）两部分的危险。对于拿下上党这个战略目标，秦国上下同心，势在必得。秦攻韩国的上党，本是一场局部战役，由于冯亭“戏剧性”献地赵国（公元前262年），秦赵剑拔弩张，一场局部战役升级为战略对决，秦军因应形势迅速“换挡”。

然而，赵国对此并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，对于是否接受送上门来的上党意见不一。赵国重臣平原君赵胜和平阳君赵豹各执一词。没有想明白的事情，很难做明白。赵勉强接受上党，在随后的战役中，赵军连失数道防线，损兵折将、立足不稳，直退缩至长平、故关一线才稳住阵脚。面对突然提前对决，秦有必战之心，赵无却敌之志，战前胜负天平已经倾斜。

知己知彼

秦国的战略定力来自高效的谍报工作。秦军历来重视谍报工作，舍得花钱，深知用人，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战前，秦国对于赵国将领，不仅是廉颇等一线大将，对于潜在的赵军将领、诸如赵括等少壮派，都了解得非常全面细致。平心而论，赵括并不是纨绔子弟，随父赵奢起于行伍。赵奢是当世名将，用兵凌厉。阨与之战，秦军兵锋锐极，又占据地利先机，廉颇等人都未敢受命，赵奢慷慨出战，兵行险着，击溃秦军，这也是赵对秦少有的完胜。父亲这种速决战的风格，肯定为赵括所倾慕。兵者诡道，赵括可能学艺未精，所以赵奢有言，赵括未可独当一面。

长平后期，廉颇坚守不出，秦军要打破僵局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廉颇出局。长平之战，是战略决战、是持久战，更不是赵家适应的方式，赵括控制不住。赵括一旦为师，极可能会给秦军带来可乘之机，秦军深知法门。秦军对于赵括是否“纸上谈兵”兴趣不大，而是深深“喜欢”赵家的作战风格。不然，无法解释秦国不惜代价，为赵括“造势”，“秦之所恶，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”，诱使赵国临战换帅。

秦国的情报工作和外交工作紧密配合。长平之战有一个疑点，就是在最后阶段，为什么赵国精锐的北部军团不回救长平。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，秦运筹帷幄，下好了先手棋，可能用重金厚礼收买了北方匈奴，对赵国北部实施了极

长平之战：战略定力

□ 崔庆

大的压力，使其精锐军团无法回护。同样，赵国粮草不济，向齐国求助，齐国拒绝，这其中也有秦外交活动的身影。

手中有粮

秦国的战略定力来自充足的后勤保障。关于长平之战的持续时间，有一年说，也有三年说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场持久战。上党远离秦土，秦军远道而来，按照常理，赵国可以“以逸待劳”，但实际果真如此吗？

军心之稳，粮草充足是基础。那么，赵与秦到底谁更有底气打一场持久战呢？首先，长平之战前，秦已经据有关中平原、成都平原、江汉平原、河东之地，这可以说是当时天下的四大粮仓，“秦富十倍天下”。赵国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，只有以晋阳为主的太原盆地和以邯郸为中心的漳滏流域，农田面积无法与秦相比。其次，商鞅变法之后，秦国高度重视农业，推广耕牛技术，单产较高。同时，秦注重兴修水利，不仅便于灌溉农田，也便于转运军粮。

长平之战后期，赵国窘态毕露，甚至向齐国请求粮食援助，如何让前方将士沉着应敌呢？赵括就任主帅后，一改老将廉颇的守势，主动出击，这其实是赵国决策层在内无粮、外无援状态下无比焦躁的反映。赵括乃血勇之人，困决之时斗志未失，亲率全军突围，事实上也造成了秦军的重大伤亡。只可惜赵括这把“快刀”没有用对地方，注定要在长平折戟沉沙。“军无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，无委积则亡”。实为千古不变兵要。

秦军规划清晰、知己知彼，粮草充足，势定、粮定、军定，长平决战未开，其实胜负已见端倪。

陶渊明的菊柳桃花之意象

□ 谢德新

《晋书·隐逸传》以孙登开头，陶潜结尾，是很有意思的。撇开年代的因素，孙登和陶潜是大为有名的两大隐士。孙登除了火与光的那段话，不见诗文留世，陶潜却诗文传世甚多，而且质量很高。其田园诗、归隐诗的艺术成就开创了一个流派，影响绵延长久。

除诗歌外，《归去来辞》《桃花源记》《五柳先生传》几篇传世之文辞章优美、立论新颖、意味深长，进入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行列，对陶诗、陶文的研究专著如汗牛充栋，迭出新章。研究陶渊明的作品，是专门的学问，笔者不敢妄加评论，仅就上述几文之意象，略发一点感慨。

陶渊明喜菊、爱菊、赏菊。亲手植菊南山下，一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大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，人菊天然化一的意旨不言而喻。菊为何物？生长于山野，怒放于深秋，有金黄之艳丽，不求人赏；有错时之生机，避开百花争伍的春光，伶仃独怜，倒与陶渊明的个性、经历、追求相吻合。菊花香味不浓，性味不甜含蓄，落萼时瓣瓣花落，耐风霜日长，且开放的花朵纠结成团，甚而瓣张虬劲，毫无媚态。这不正是一个不媚权贵、不堪折腰、躲过人间喧哗、宁静独处，心中尚飘人格的淡淡馨香，独怜自爱的诗人形象吗？更别说了，陶渊明喜喝酒、常醉酒，对时事偶冒燥火，拣几瓣菊花泡茶解渴，以达清心明目、舒缓肝火郁结之功效。

陶渊明还喜柳，在屋舍旁满怀深情地植柳，自号“五柳先生”，并有《五柳先生传》传世。他对桃花也是情有独钟，奇文《桃花源记》，述桃花甚美，他没有写成菊花园记，这又是因为呢？柳与桃花是世间更常见之物，也是诗文常借喻意象的普遍之物。人以柳喻代别离，杨柳依依，《诗经》早开

先河；柳永的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更是脍炙人口；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尽抒云淡风轻之境。这些意象似乎与陶渊明的追求是大相径庭的。桃花更是如此了，桃花艳艳，桃实灿灿，人们以桃花比美人；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，更是将桃李喻为城中追逐时尚喧闹之物，并与野生的荠菜花相对应，无疑，陶渊明当属荠菜花，生就荠菜花本性的陶渊明，却在凝聚自己美好理想社会的桃花源借桃花以言事，不是大为矛盾吗？

柳与桃花的形象被陶渊明所借喻，所讴歌，或许不是出于偶然。陶渊明是出世的，他看尽风流奢华，不耐市井喧闹，到僻静的山村寻找宁静之地，告别这些喧哗、热闹，他大义凛然，决然决断，一篇《归去来辞》，声情并茂。“田园将芜，胡不归？”“鸟倦飞而知还”“抚孤松而盘桓”，意志不坚决，则没有如此决断之文；情感不逼真，则没有如此深情之境。归隐之后，看春风杨柳，垂枝千条，或许是对人间有着依依之念吧，故而，他没有隐于深山求仙得道，只是在僻静的乡间，与菊花、山岚为伴。

有桃花的地方，有人间，有炊烟，野桃成林处，也有猴群光顾，有生命，有活力。陶渊明生于门阀贵族，曾祖陶侃曾为当朝一品大员，他自己则躬耕自养，自得其乐，其实生活过得十分艰苦，“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，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”，是他艰苦生活的写照。然而富贵荣华不是他生活理想所追求的，五谷丰登，鸡鸭成群，茅舍三间，桃花几株，青山远望，小溪穿径，是他真实的桃源生活。那个自给自足，其乐融融的桃花源，既无官役之束缚，又无冻饿之忧愁，不是很令人神往吗？他选择了桃花这个意象，因为与桃花相比，孤



菊太凄清了，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，世上又有几人能做陶渊明呢？何况桃花源这个理想国的主角是山民，山民唱的戏要用山民的语言，体现山民的美学情趣，所以桃花是适宜的。

菊与柳、桃，在文学意象上是矛盾的，这矛盾恰恰统一于陶渊明的文学追求中。或许，这正展示了陶渊明心底的另一面，这另一面的深处，有矛盾、有纠结，有平静海面下的漩涡。

菊孤标傲世，柳别情依依，桃花夭夭明媚，都是世中物，各有一片天地，各自风流，风流人可以赏菊，可以植柳，可以在桃花源内体验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



唐代：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定型阶段

□ 张晋藩

汉以后，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、大变动、大分裂和民族大迁移时期，割据对峙持续数百年。大一统的唐代建立以后，监察制度发展到了典型阶段。唐初统治者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比较清醒地认识到，监察机关对于维护国家纲纪的作用，因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。据《文献通考·职官七》记载：“贞观初，以法理天下，尤重宪官，故御史复为雄要。”唐玄宗在《伤御史·刺史·县令诏》中说：“御史执宪，纲纪是司。”睿宗更进一步表示：“彰善殛恶，激浊扬清，御史之职也。政之理乱，实由此也。”

唐代建立了一台三院的监察制度。台是御史台，御史大夫、御史中丞为长官，下设三院，台院、殿院、察院。台院设侍御史四人，掌管京官

的司法监察；殿院设殿中侍御史六人，整肃朝会官吏的礼仪；察院，武德初年设监察御史八人，贞观二十二年增至十人，按所设道监察地方官吏。察院是三院中最重要的职能部门。

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，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。开元二十一年改全国为十五道，监察御史亦增加至十五人。监察御史品秩虽低，但有权以六条巡按州县，百司畏惧，是皇帝的耳目之司。

唐朝官修的《唐律疏议》和《唐六典》，为监察机关的设置、职掌以及监察官的活动提供了大纲大法，加上皇帝临时颁布的有关诏令和专门监察法规，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监察法网，可以说是唐朝监察制度完备的一个体现。唐朝的监察法以《监察六法》为代表：“其一，察官人善恶；其二，察户口流散，籍帐隐没，赋役不均；其三，察农桑不勤，仓库减耗；其四，

察妖猾盗贼，不事生业，为私蠹害；其五，察德行孝悌，茂才异等，藏器晦迹，应时用者；其六，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，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。”

唐《监察六法》既传承了汉《刺史六条》，又根据“义在随时”的原则作了重大发展。主要是监察所及，遍于所有的官僚系统，而限于地方高官和强宗豪右。除监察官吏是否违法失职外，还涉及户口、赋役、农桑、库存等重要的经济目标。

